

从《城市季风》到广泛的社会关怀

——记社会学、教育学知名专家杨东平

王 慧

(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 本文记述社会学、教育学知名专家杨东平先生的学术、社会活动历程, 展示了他从城市文化到环境、教育的研究范围, 从人文到社会发展方面广泛的社会关怀; 着重评述他 1994 年出版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一书及 2006 年修订版的影响和他对京沪两个城市的认识与反思。

[关键词] 杨东平; 《城市季风》; 教育学者; 社会关怀

[中图分类号] C9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08) 01-03-05



杨东平先生在书房

1994 年, 由杨东平先生独立撰写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一书出版, 风靡了整个学界, 此书被誉为“中国的双城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他又凭借极具个性化

写作风格的“城市季风”系列在学术界独领一时风骚, 以此开辟了城市文化研究的先河。从此, 他的名字更加广泛地为人所知, 成为了知名的学者。

[收稿日期] 2007-10-20

[作者简介] 王慧 (1981-), 女, 内蒙古人, 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助教。

“季风”来临

杨东平先生关于上海和北京的研究始于 1986 年的一篇小文。他应友人之邀,在上海《青年一代》杂志发表的短文《京沪青年:差异和互补》引起出乎意料的反响,使他意识到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和两种文化的比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当时,他已在北京生活了 15 年左右,对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大城市的命运、文化差异有了越来越丰富的材料和感觉。而他两地多年的生活经历,对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等许多门类的兴趣和涉猎,都是他的优势和资源。看到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关于上海近代史的专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更激发起他对城市研究的兴趣,开始默默地酝酿、构思这一主题,并系统地搜集资料。但是,当时他并未将写作提到议事日程,而是将它推到遥远的将来时——退休之后。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当时他正在全力以赴地参与当时的教育改革。但因为那些强烈批评现行教育、敦促教育改革的文章在教育领域根本无法发表,1990 年后,出现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间隙,使他可以关起门来写自己的“闲书”。从 1991 年开始,杨东平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初名《海派京腔》。没想到的是,此后又经历了一个两年,书稿在不同出版社之间痛苦地“旅行”。在当时文化低迷的行情中,多数出版社都不看好这本书,直到最后遇到东方出版社的著名出版人方鸣。他不仅断然拍板,而且颇费心思为此书起了个响亮的书名。1994 年初,《城市季风》出版发行,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城市季风》被誉为“现代中国的双城记”,它突破了“国家”的笼统观念,开启了地域文化和城市文化比较的先河。而且成为许多初到上海、北京工作的年轻人的“市情”教科书。面世之后,先后重印 6 次,并且出版了海外中文繁体版和日文版。由此刮起的城市和地域文化研究的“季风”至今不衰,带动了一个关于地域文化、城市文化、城市人之类书籍的出版热潮,其中的佼佼者有王军的《城记》和易中天的《读城记》等。

上海是杨东平的故乡,而北京是他现在的生活、工作空间,在上海与北京各二十多年的生活

经历,使他对这两个伟大城市的文化命运、文化差异有着独特的领悟和感受,也有强烈的感情。他于 1969 年从上海市上海中学毕业后赴黑龙江插队,1972~1975 年在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系学习,毕业后留校。远离上海之后,他才逐渐感悟了上海曾经被轻慢的如“初恋情人”般的种种好处;而在北京,他不仅作为“前排观众”,而且作为大潮中的一员,亲身参与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他将自己对这两个城市的热爱、领悟和百般感慨强烈地表达了出来。全书分为“城市之风:中国的南与北”,“京派和海派:风格的形成”,“京派和海派:双峰对峙”,“新北京:光荣和梦想”,“革命文化:新的中心”,“海派的嬗变”,“上海文化:新海派”,“新北京和第三代人”,“上海人和北京人”,“三足鼎立:九十年代新格局”这样 10 个章节。在大文化的视野中,从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历史事件、风俗民情等诸多方面观察当代社会生活,打破了以往只在小说、影视、民居等单一领域的文化比较,让读者在平行的阅读中深刻地体验和感受北京与上海两地的历史、文化及其发展变化。此书大胆地涉入了风云激荡的当代史,直面 1949 年以来两个城市的命运、文化和人格的嬗变。直接描写我们的共同经历和身边的生活,是它大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城市季风》的文体。

《城市季风》的体裁是很独特的,是一种介于理论著作与通俗读物之间、以专业人士之外的大多数人为主要读者的“文化读物”,从而导致了一些学者“不规范”的批评。杨东平暗中追求的写作目标,他心仪的对象是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以及美籍华人社会学家许琅光教授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其实,在国外的出版物和畅销书中,这种具有学术或专业背景的个性化写作是一种很重要的样式。从《城市季风》之后,这类“好看的”文化书就越来越多了。

初版《城市季风》中对当代上海和北京的描写,反映的主要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历史。其文化价值在于开辟了城市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研究热,10 年来,这个领域已经逐渐学科化、专业化,出现了大量的专门研究,每年都会发布各



《城市季风》手稿

种版本的“城市竞争报告”。然而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狂飙突进般的巨变。在近 10 年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大城市的城市病已日益严重。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城市美化运动”正在深刻改变城市的面貌与功能和生态。很多大城市以大草坪、大广场、景观大道或摩天大楼等为追求，打造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但这并不是从市民生活的内在需求中产生的，不是城市的有机生长。北京和上海的问题最具代表性。北京的古都文化正在人们眼前被日新月异地摧毁。而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的崛起虽令世人侧目，但作为文化大都市的复兴却令人失望，至少目前还看不到希望。面对经济建设热潮中古都风貌保护的严峻形势，杨东平开始思考：作为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市究竟是建设成商业中心还是文化中心？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和保护古都文化？2006 年，新修订的《城市季风》增加了“十字路口的城市”和“上海新天地”两个新章节，对近 10 年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进行了锐利的揭示和批评，表达了杨东平先生对当代城市问题最紧迫的关注。在“保卫文化的北京”的章节中，他不无悲愤地记录了发生在首都、“与推土机竞赛”的“古都保卫战”——事实上，他亲身参与了其中的多次“保卫战”，结果自然是屡战屡败。他追溯了导致北京古城被毁的不同因素：如果说在“文革”和“文革”之前，这主要

来自否定封、资、修的“左”的意识形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很大程度上来自以盲目求新和运动式、突击式的工作模式为特征的建筑领域的“革命文化”；那么在 90 年代之后，由房地产催生的城市“旧貌换新颜”，就主要是一种“权力美学”和“拆迁经济学”了。痛定思痛，他对“谁的城市？怎样规划？”这样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与此同时，在新的城市格局中，“双城记”的说法被迅速更新，鹤立鸡群的“京海对峙”已经陈旧。“北京与上海这种曾经惟一的搭配已经打破，今天无论上海还是北京，莫不以与纽约、巴黎、伦敦成为‘姐妹’而荣耀，并且以曼哈顿和香港为主要的追捧对象”。香港—上海的“双城记”变得更为令人关注和意味深长：“老上海曾经是香港的版本，而今天的新上海却更像是香港的现代或者后现代的复制，重演了房地产业取消历史、改变城市的一页。人们意识到，或许在上海与加尔各答、与台北这样的比较中，蕴涵着更丰富的启示和意义。”

他担心“城市正在离市民生活越来越远，成为一个为满足观光客的趣味，炫耀城市虚荣心的容器，成为主要供人观瞻、显示成就的展示性空间，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绚丽的窗口和舞台”。当城市变得日新月异、光怪陆离时，“从骨子里，上海人是更迷恋‘旧天地’的，它体现着海派市民文化的一种‘根性’”。在陈良宇倒台之前，杨东平先生就对上海的发展模式作出强烈的揭示和质疑，是难能可贵的。

事后回顾，杨东平觉得完成这样一部著作，不仅需要阅历和学识，更为需要的也许是勇气和毅力。他之所以被认为“新锐”一些，不是这些问题别人没有看到，而是比别人多一点说真话的勇气——中国的理论创新，很大程度上需要的首先是勇气、正直、良知。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应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恢复常识，拿来而已，例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例如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例如现代大学制度，等等。

偶然成为教育学者

在青年时做过文学梦的杨东平先生，由于在

上世纪 80 年代初发表了一篇教育研究的文章而走上教育研究的道路。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关注、思考和直接参与,成为杨东平从事教育研究的基本特征。2003 年,杨东平的专著《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 20 世纪》出版,成为专门研究新中国教育史的力作,较深入地探讨了“文革”前 17 年的教育、“文革”时期的教育,以及毛泽东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理想。有别于教科书式的写作,此书同样视角独到、文字生动,怀有对历史理解和尊重的温情。在每一章后面附录具有时代特征的“经典文本”,如 20 世纪 30 年代北京大学的入学考卷、40 年代小学生的一篇作文、60 年代红卫兵表忠心的大字报等等,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质感,使得教育的历史得以被亲近和触摸。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我国经济和教育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上学难、上学贵”等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杨东平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对我国教育的公平状况进行了大量的实证调查,2006 年出版了《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剖析了中国教育不公的诸多症结,深刻揭示了“教育产业化”、“转制学校”、“择校热”等导致教育不公正的制度性原因,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是教育公平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他相信教育公平是一种值得追求、并且可以追求的现实的理想。重要的不仅是发展教育,而且是要追求“公平的发展”,使得教育发展的成果为人民群众所共享,通过体制改革,追求一种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在进行重大教育科学课题研究的同时,尽管工作很忙,杨东平仍坚持为《新京报》等多家媒体撰稿,参加电视节目,频繁接受各种采访,直接“面向公众发言”,宣传先进教育理念。他提倡“两把刷子”的理论,认为一个学者不但要能够从事小圈子里的专业写作,而且要能够面向大众写作,面向社会发言,成为社会参与的重要渠道,这甚至比“核心期刊”的论文更为重要。“五四”一代的大家,正是这样的典范。杨东平主编的《教育:我们有话要说》、《社会圆桌》、《大学精神》、《大学之道》、《中国教育蓝皮书》、《中国环境绿皮书》,随笔集《倾斜的金字塔》、《最后的城墙》、《无梦时代》、《民谣中的城市》

等等,以及他的个人博客,都同时受到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的好评。

“触电”学人和绿色使者

杨东平先生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还有着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终不断。对社会问题,他发出的声音是独立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作为一个深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从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书斋中,而是利用自己的专门知识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主动利用大众媒体,代表社会公正、社会良知面向公众发言,对社会舆论和决策施加影响。他的名字更多地为人所知,是由于他参与策划中央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

1995 年底,杨东平与郑也夫等一起参与《实话实说》的制作,后来担任《实话实说》的总策划。1996 年 4 月,《实话实说》出乎意料地一炮走红,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牌节目,使电视屏幕出现了“谈话”的热潮。交流和倾听是人们的基本需要,而讲真话本身是具有足够魅力的,而且是社会生活中相当稀缺的资源,追求真实于是成为《实话实说》的灵魂和生命线。《实话实说》致力于营造一种真实的谈话现场,使得人们在摄像机前可以像在家中、在朋友之间那样说话,让已经习惯了在电视上说官话、套话、空话、假话,以及过多的朗诵、背诵、播音和表演的观众眼前为之一亮。杨东平认为电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空间,能够让学者的思维贴近社会



骑车族——环保主义者

大众。从《实话实说》到后来担任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总策划，杨东平成为知识界著名的“触电学人”。他十分珍视这段经历，他说：“能够见证一个‘历史性’事件是幸运的；能够亲自参与这一事件，与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做一件喜欢的事就更为幸运。”

杨东平先生将社会责任深植于内心，不但思想、写作、研究，始终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走出书斋，实际地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务。在研究、写作和参与大众媒体之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领域——作为 NGO（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积极参与社会建设。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参与是一种自主型参与，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之中，社会结构变迁的特征之一，是社团等社会中间组织大量涌现，从而在国家与市民之间构筑社会的空间，成为公民社会参与的重要渠道”。

1994 年春天，他与梁从诫先生等一起，发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必须有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的参与，走向群众性的绿色运动。“自然之友”以开展环境教育、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建设中国的绿色文化为己任，所进行的拯救滇金丝猴、保护藏羚羊、呼吁首钢搬迁，参与举行圆明园防渗膜工程听证会等等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杨东平还成为另外两个 NGO “21 世

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和“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领导人。他相信社会进步是各种合力的结果，力图为这个剧烈变化的社会发挥一点力所能及的作用。2004 年，他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 50 个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在纪念“自然之友”成立十周年的感言中，杨东平写道：

积十年之成效，中国的 NGO 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显著存在。虽然在他们为大自然请命的抗争中，可以说是败多胜少；但他们仍然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积极行动，屡败屡战。他们是一群无私的挑战者、清醒的奉献者、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因而，他们经常被人视为天真或偏激。然而，社会并不总是循着“聪明人”的意志。回头看时，我们竟然比当初所能想象的走得更远，正如龙应台在获文学奖时的感言，“好像在漂泊的路上忽然发现一蓬当年种下的金盏菊，刚好盛开”。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杨东平说，人的一生能做几件“第一”的事是令人欣慰的：第一本城市文化研究著作、第一个电视谈话节目、第一个环境 NGO、第一本公民教育读本、第一个民间教育改革方案……如今，他仍然在教育研究、参与大众媒体、NGO 等不同领域穿梭忙碌，以学者的良知和实际行动参与社会变革，酝酿着新的突破。

From *City Monsoon* to Widely Social Solicitude

——Mr. Yang Dong-ping,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WANG Hui

(Inner Mongolia Radio & TV University, Huhhot 01001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narrates the academic and public activities of Mr. Yang Dong-ping, an expert in sociology and education, whose social solicitude is in a wide range from environment to education, from humanities to social development. It also focuses on his book *City Monsoon: the Cultural Spirit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published both in 1994 and 2006 (revision) in which he expressed his reflections on the two cities.

Keywords: Yang Dong-ping; *City Monsoon*; educationist; social solicitude

(责任编辑：窦 坤)